

◎教育政策与学校领导系列丛书

卢乃桂 / 主编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CHOOL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学习型学校的创建

——教师组织学习力新视角

张兆芹 卢乃桂 彭新强 著

◎ 教育政策与学校领导系列丛书

卢乃桂 / 主编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CHOOL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学习型学校的创建

——教师组织学习力新视角

张兆芹 卢乃桂 彭新强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型学校的创建: 教师组织学习力新视角/张兆芹, 卢乃桂, 彭新强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 3

(教育政策与学校领导系列丛书/卢乃桂主编)

ISBN 978-7-5041-5616-7

I. ①学… II. ①张…②卢…③彭… III. ①中小学-师资培养-研究 IV. ①G6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4226 号

学习型学校的创建

XUEXIXING XUEXIAO DE CHUANGJIA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19
传真	010-64891796	网址	http://www.esph.com.cn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作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印张 23.25

字数 389千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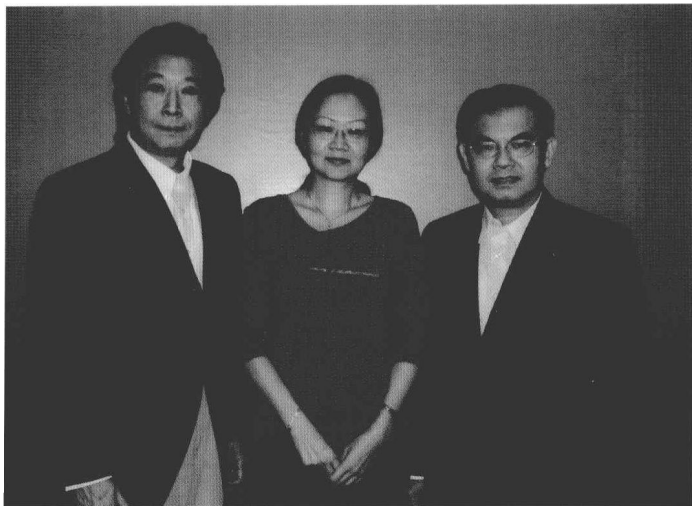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定价 47.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卢乃桂 张兆芹 彭新强（从左到右）

张兆芹，女，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育哲学博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深圳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学习型学校发展和教师教育研究等。

卢乃桂，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讲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政策研究和教师发展研究。

彭新强，男，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育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领导发展中心学校发展及评估组主管。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领导与校长发展、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学校评价等。

总 序

当今时代，变迁已成为恒常。

人类社会无疑再次进入了大变革时代，其变化的速度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知识的更新令人匪夷所思。有论者认为，信息科技的急速发展让一些崭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出现，如“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而它们又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学习和沟通的观感和习惯。至于那些要肩负国家发展重任的人才，人们也抱着前所未有的期望。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是培养既通且专、处变不惊的人才。因为这些社会蜕变，教育也同时改革，以配合时代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让国际竞争加剧，国力与人才素质便成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的发展关键。

国际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巨变也对本国的教育体系提出了繁多而迫切的要求。教育变革的节奏于是加快，变革的程度也相应加深。教育必须不断调适，才能适应外在环境的需求。教育改革策略的实施和有关政策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一浪接一浪的教改大潮。美国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颁布以来的系列改革、英国的“国家语文与数学策略”、荷兰的高中课程改革、中国大陆的“新课程改革”、中国台湾的“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课程改革等，无不凸显了一种“科教兴国”的改革意向，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口号声中祭起教育改革的大旗。

综观全球教育的变革路向，各国的策略焦点经常是先在教育系统内和学校内设置素质保证机制和流程来改进其效能，继而是关注教育的外显功能（如学校的增值功能和毕业生的素质），然后便是通过全球性的视角检视本国教育的成就、位置和潜力。有关的教育改革政策，多为由上设计、交下执行，以行政力量推动和延续的策略模式。然而，当这些政策试图在学校层面落实时，其实施形态便变得多样和众彩纷呈了。在这里，无论是教育领域内

部的当局人，还是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都会问：教育改革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的教育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其实，教育改革政策在实施期间被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意义，或因执行的误差而使其异化甚至变质，这些都是系统化大型改革经常发生的事。人们看到当今改革的“纷乱”状态，甚有可能是反映了有关学科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和多元化。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有关教育政策的探究，已由政策评论逐渐改变为政策分析；有关教育管理的探究，也由对学校内部行政运作的关注改变为教育领导的培养和发展。此中最大的转变，是政策分析和教育领导两个学术范畴皆有意识地、积极地摄取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和采用其研究工具与方法。在社会和学校的层面，政策的得失利弊和管理的优劣敏拙，已不再只靠常理的推测，而是靠较严谨的计算和观察而得以呈现。

学术取向的转移使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得到一种新的出路，即探究对象的“人本化”，由过去主要以系统、组织和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渐改为同时以其中的人物和事情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取向。政策分析落实至个人和小组层面，能让分析更加深入和细致。教育系统和学校的运作如何受教育改革影响，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因为探究中注入“人”的元素而更具真确性。教育行政学渐朝教育领导学发展便是佐证。无论是通过大型的调查研究，或是小型的个案研究，教育改革的得失和影响皆能在此新的探究取向中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让人们能达致较全面的理解。

基于对上述教育改革问题和学术发展取向转移的关注，编者盛邀相关领域学者参与撰写“教育政策与学校领导系列丛书”，以期探讨教育在变革时代的议题。整个系列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性比较研究。如前所述，当今社会处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教育信息的传播无远弗届，教育政策的相互借鉴也日益普遍。因此，从国际或区域比较的角度对教育现状展开分析和探讨，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教育改革议题，是適切和必要的。

第二个层面是个别国家具体教育政策的研究。一定意义上，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映出全球化与本土化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只有深入检讨个别国家的社会发展脉络，才能发现其教育改革政策背后的特殊性所在，才能理解其具体措施的成效和合理性。

第三个层面是学校领导与教师发展的研究。如果缺乏对学校层面的关注，教育政策的实施将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将教师视为教育变革的能动力量，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赋权增能，改革才能持续下去。在此过程中，学

校领导作为教师与政策的缓冲器，其本身的角色和发展亦同样举足轻重。

“教育政策与学校领导系列丛书”的选题力求多样化，所采用的探究形式亦不拘一格。出版丛书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循多元的角度，理解教育改革的意义和明白参与改革的人所面对的挑战。

变革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如何通过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广大教师创设有利于其潜能释放的教学环境，最终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丰富其人生，是我们这些矢志教育事业的人必须承担的使命。在此，也希望本系列丛书能在这方面贡献绵薄之力。

是为序。

卢乃桂

2007年4月识于香港

前 言

中国实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试图改变应试教育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等机械训练现象，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以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取代繁难偏旧的教学方式，突出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的多样化，倡导对学生学习评价的真实、鼓励和发展取向。新课改给广大教师的学习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带来许多严峻挑战。在新课改实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师的不适应，普遍感觉压力大，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遵循，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经验积累；有些教师教学观念转变不到位，还固守着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新课改的理念和追求考试升学率的现实不相适应，教师感到无所适从；教师缺乏专业自主权，教学方式和手段未能与时俱进等。众所周知，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因为新课改的新理念和新内容必须通过教师的实践来实施，因此，新课改成功的关键在于教师发展和教师能力的不断提升。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强调：在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上要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核心内容，保障教师发展与课程改革同步推进。而教师发展的核心是培养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断改善心智模式。基础教育新课改所倡导的学习是以人的创新学习为基点、以终身学习为基础、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是敢于面向真实复杂的情境的学习，是与他人协作、分享的学习。而这些都需要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作为指导来构建学习型学校，建立学习共同体。教师面对新课程改革的冲击和挑战，从开始茫然、不认同到认同，积极改变心智模式，不断学习创新。而学习型学校强调植根于学校情境，在实践中学习，尤其强调协作学习、教师集体学习，建立反思分享的学习文化，相互观课、共同讨论、协作研究、在实践中反思，不断内化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不断提高个人能力和组织学习力，促进师生专业成长，从而提高学校适应环境能力和创

新能力。

学习型学校的核心概念是组织学习。组织学习是响应变化的环境的基本策略，是为培养组织处于复杂系统中的应变和创新能力的过程。如何建构学习型学校（也称学习共同体或学习型专业社群等），不断提高教师素质以提升学校教育效能，是国内外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而学习型学校、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的观念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张明辉，1999）。学习型组织源于组织学习。学习型组织强调的组织学习是创新学习，学习不仅发生于个人，更是扩展到团队、组织系统的学习。学习型组织必须进行组织学习，但有组织学习的组织未必就是学习型组织，只有具有学习型组织特征的组织学习才是本研究的核心。组织学习是在一定的组织学习文化背景下经集体思考、反思、对话而产生的，它带来的不仅是组织结构的调整，而且是学校文化的改变及学校成员思考与行为模式的转变，促进组织不断创新与完善。其中，组织学习力的建构是建立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基础与先决条件，也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能否构建学习型学校，不断提高学校组织学习力，不断促进教师发展，解决教师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能不能真正落实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能不能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养成？能不能提高学校效能和竞争力？这些是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书首先讨论了国际上学校发展的趋势和中国大陆的学校发展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研究背景，具体分析了中国大陆学校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讨论了中国大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学校面临的困境，分析了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实行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其核心理念、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是什么，及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重点分析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师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教学方法难以内化为教师的教育信念和自觉的教学行为、教师只能“适应性学习”而不能“创造性学习”的潜在原因，主要是中国大陆教育改革缺乏系统思考，使教师处于两难境地。并利用复杂性理论进行分析后得出，教育改革要顺利进行，必须要组织学习，整合资源，形成教育改革协作共同体。指出学校改进一定是归向于学习层面，建构学习型学校，建立学习共同体，通过学习不断创新和改变，不断提升学校效能。同时，对学习型组织理论在中国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评析，特别是对学习型学校难以有效实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知道，学习型学校理论和实践研究在中国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如何建构适合中国场景下的学习型学校理论还有待研究，因此，如何创

建本土化的学习型学校是本研究的核心。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由内向外，以学校教师组织学习力和组织学习效果高低为基础选择学校，进行个案比较研究，重点研究学校教师组织学习力和效果高、教师效能和学校效能强的优质学校的基本特征和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具体来说，在文献研究和深圳本土的办学经验基础上建立学习型学校的概念架构以及建立教师组织学习力和效果的概念架构，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组织学习力量表和教师组织学习效果量表进行测试和选样，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不同性质学校（公办和民办）的教师组织学习力和教师组织学习效果的分值高低进行选样，选择四所有代表性的个案学校进行质化研究，通过量化调查研究和个案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教师组织学习力高，教师效能、学校效能和学校竞争力强的优质学校的特质、运行机制以及条件基础等，试图寻找在中国构建学习型学校的理论框架和基础条件。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在国际学校教育改革和中国大陆学校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概念框架和研究意义。第二章，学习型学校的理论基础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与本研究的理论背景及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包括学习型组织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研究分析，教师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学习型学校的研究分析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校组织学习力的建设性框架和所要研究的问题等。第三章，学习型学校的实证研究，确定了研究的框架、具体研究领域、方法和思路。第四章，量化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是对收集的数据资料结果分析和讨论，分别根据研究问题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以量化研究为基础选出本研究的个案学校。第五章，个案学校的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是对个案学校现场情境访谈和观察进行分析和总结。第六章，个案学校的比较分析和讨论，分别进行了量化比较研究和个案比较研究。第七章，中国学习型学校创建的建议，是在前六章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大陆学习型学校创建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大陆学习型学校的理论框架，不断丰富和发展学校教育管理理论。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一、国际上学校发展的趋势	(1)
二、中国大陆的学校发展和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	(5)
三、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0)
四、学习型组织理论在中国发展的现状述评	(18)
第二节 研究对象	(23)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问题	(27)
第四节 概念架构	(29)
第五节 研究意义	(33)
第二章 学习型学校的理论基础研究	(35)
第一节 学习型组织理论的研究	(35)
一、学习型组织理论发展的背景分析	(35)
二、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	(38)
三、学习型组织的含义	(41)
四、关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研究的文献审视	(43)
五、关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争议和讨论	(50)
六、文献评析的发现和启示	(53)
第二节 组织学习的研究	(54)
一、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关系	(55)
二、关于组织学习的研究文献审视	(59)
三、文献评析的发现和启示	(84)

第三节	教师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85)
一、	教师学习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	(85)
二、	教师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	(87)
三、	文献评析的发现和启示	(99)
第四节	学校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研究	(100)
一、	学习型学校的含义和特征	(100)
二、	对学校作为学习型组织的构建策略的研究	(101)
三、	学校教师组织学习力 (OLCS) ——一个测量的建议 性框架	(105)
四、	文献评析的发现和小结	(110)
第三章	学习型学校的实证研究	(112)
第一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框架	(112)
一、	研究问题	(112)
二、	研究框架	(113)
三、	主要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113)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确定	(115)
一、	对研究方法的选择	(115)
二、	量表的预试和正式量表的生成研究	(115)
三、	对质化研究的选择	(138)
四、	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143)
五、	小结	(144)
第三节	研究的效度和信度问题	(145)
一、	效度问题	(145)
二、	信度问题	(145)
第四章	量化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	(146)
第一节	深圳市学校量化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	(146)
一、	深圳市中学教师组织学习研究结果描述性分析	(146)
二、	深圳市中学教师组织学习力的相关分析	(147)
三、	深圳市中学教师组织学习力的多元回归分析	(152)
四、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比较分析	(156)

五、讨论	(158)
六、小结	(162)
第二节 质化研究四个个案的选取	(162)
一、参与学校组织学习力和组织学习效果比较	(162)
二、选取个案的依据和四个个案学校的特征	(163)
第五章 个案学校的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	(167)
第一节 个案学校 A 的研究发现与讨论	(168)
一、学校历史背景和被访者简介	(168)
二、A 学校组织学习力和组织学习效果的量化结果描述	(169)
三、A 学校个案的研究结果和讨论	(170)
四、A 学校组织学习的特征小结	(189)
第二节 个案学校 B 的研究发现与讨论	(190)
一、学校历史背景和被访者简介	(191)
二、B 学校组织学习力和组织学习效果的量化结果描述	(192)
三、B 学校个案的研究结果和讨论	(193)
四、B 学校教师组织学习的特征小结	(208)
第三节 个案学校 C 的研究发现与讨论	(210)
一、学校历史背景和被访者简介	(211)
二、C 学校组织学习力和组织学习效果的量化结果描述	(212)
三、C 学校个案的研究结果和讨论	(213)
四、C 学校组织学习的特征小结	(232)
第四节 个案学校 D 的研究发现与讨论	(233)
一、学校历史背景和被访者简介	(233)
二、D 学校组织学习力和组织学习效果的量化结果描述	(234)
三、D 学校个案的研究结果和讨论	(235)
四、D 学校组织学习的特征小结	(246)
第六章 个案学校的比较分析和讨论	(248)
第一节 A 学校和 B 学校的比较研究	(248)
一、A 学校和 B 学校的量化比较研究	(248)
二、A 学校和 B 学校的个案比较研究	(249)
三、A 学校和 B 学校比较研究发现和启示	(256)

4 学习型学校的创建

第二节 C学校和D学校的比较研究	(262)
一、C学校和D学校的量化比较研究	(262)
二、C学校和D学校的个案比较研究	(263)
三、C学校和D学校的比较研究发现和启示	(269)
第三节 公办学校(A学校和B学校)和民办学校(C学校和D学校)的比较研究	(272)
一、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量化比较研究	(272)
二、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个案比较研究	(274)
第七章 中国学习型学校创建的建议	(280)
一、总结与回顾	(280)
二、创建学习型学校的建议	(289)
结束语	(302)
参考文献	(308)
附件1 学校教师组织学习量表	(335)
附件2 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正式量表维度	(342)
附件3 访谈提纲	(344)
附件4 访谈抄写式样	(345)
后记	(35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任何学校组织都是开放的系统，我们研究学校组织首先要研究其现在状况背后的生成脉络和影响因素。本节将审视国际上学校发展的趋势和中国大陆的学校发展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

一、国际上学校发展的趋势

欧美各国在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根据本土的学校发展经验不断推进不同的学校发展计划，希望借此改进学校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成就，以确保在全球化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力。20世纪学校发展的轨迹是对重大教育变革的反映。如学校重构运动、校本管理的研究、有效能学校的研究、学校发展计划、学校教育质量的保证、新课程计划的实施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之类的教育变革和重构运动，它们不仅发生在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发生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地区 and 大陆。

美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前后经历了三次教育变革：第一次变革的重点是集权、推广考试和提高教师素质；第二次变革强调分权、教师的赋权增能、校本管理和择校；第三次变革关注系统化的学校结构重整（Saban, 1997）。根据霍普金斯和雷诺斯（Hopkins & Reynolds, 2001）所言，欧美国家学校改进的历史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性学校改进计划”（International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ISIP）。该阶段的学校改进行

动多是松散、游离的，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为该阶段是学校改进和学校效能的结合。学校效能的研究为学校组织发展提供了智性的知识基础，而学校改进则为学校把教育变革有效地引进课堂提供了指引和策略，研究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都竭力地以系统、敏锐、规范的方法将变革策略和研究知识进行有机的整合。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某些学校改进项目取得了成效，例如施雷文（Slavin）的“全面成功计划”（Success for All）（Slavin & Fashola, 1998; Slavin & Madden, 2001）和“海尔顿计划”（Halton Project）（Harris, 2000）。

亚太地区根据本土的需要也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变革，如校本管理变革、高效能学校运动、策略管理或学校发展计划、学校教育素质检查、问责制度的确立和推行等，都是重要的学校管理改进项目。在香港，教育及人力统筹科和教育署（Education and Manpower Branch &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1）提出《学校管理新措施》（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尝试将全港中小学由“外控管理”模式转为“校本管理”，并推行策略管理的机制，以促进学校的发展。随后，又进行了学校改进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获香港特别行政区优质教育基金拨款，与香港数十所中小学合作推广香港“跃进学校计划”、“优质学校计划”（Quality School Project，简称QSP）以及彭新强教授的“学校发展与学校自我评估”项目（学校发展评估组，2003，2004，2005），都是对香港学校发展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运作首先是对大学协助参与的学校进行情势检讨，让学校对自己的教学和管理情况先有充分了解，建立以不同主题互动的校本教师工作坊，协助学校同事确立共同目标、建立团队文化和有系统地建立学校的自我完善机制。同时，透过工作坊向学校同事介绍各种教学和管理的新理念，并付诸实践，协助学校建立自己的特色，提升教学质量。学校改进是持续的，拓宽教师团队的视野和见识以及工作上的互动，不断培养协作和反思文化，增强教学能力，改善学校团队文化，使学校目标趋向一致，能发挥分工合作、各展所长的优势，帮助学校全面改善素质。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了大规模教育改革，其关键是以培养学生具备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素质教育的实施为中心。在学校发展模式上，通过各种途径，深入挖掘和形成学校内部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机制，使学校内部形成本土的学校组织文化、积极向上的组织氛围，形成学校发展特色。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等地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资助，开展了“中小学学校效能指标”的研究项目，1999年又与美国进

行“高效能学校：用测量改进管理”的后续研究（范国睿，2003：216）。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引进了“学校改进计划”项目，在一些中小学开展实验研究。2001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正式引进了“学校发展规划”项目，并首先在甘肃等13个西部地区开展中小学校长培训试点（范国睿，2003：216）。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自2001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大重要教育改革，即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新基础教育和基础教育新教育实验（朱永新，2008：66）。朱永新认为：新课程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课程，它是通过课程的变革来改变教育，基础是课程；以叶澜教授为首的国家重点课题“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叶澜，2004）的逻辑起点是课堂，提出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关注学生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而新教育实验的逻辑起点是教师，以改变教师的行为方式为宗旨，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基点，以六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他认为：只有教师的发展才能带动学生的发展，只有教师的成长才能带动学生的成长，没有教师的快乐就永远不可能有学生的快乐（朱永新，2008：60）。

综上所述，国际上学校发展的研究趋势就是在校本脉络情境下的学校效能和学校改进的研究。学校效能的研究较倾向于以科学化、理论化的取向判断学校，多用量化研究法，其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践认识论；而学校改进研究则集中于实践中如何帮助学校应对变革和进行变革计划，常用质化研究法，其源于组织发展理论。怀特（White，1997）质疑很多研究计划中的学校效能定义都过分倚重学生短期的学习成效，而忽略了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长期教育目标。菲尔丁（Fielding，1997）对于学校效能和学校改进的归因研究也持保留态度。他试图在学校改进的过程中，挖掘影响变革的积极因素和勾画变革的潜力，并倡导一种“转化型教育”（Transformative Education）——发展转化型的学生参与，探寻合作文化、进入团队协作的转化型模式的对话结构和实践（Fielding，1997）。对学校效能、学校改进领域工作给予最强烈批判的是Thrupp（1999，2001）。斯拉普（Thrupp，1999）批判说，从事学校改进研究的学者们至今所描绘的学校改进蓝图，都未能清晰地指出变革的社会限制，以及新自由主义和管理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哈里斯（Harris，2000：1）概括了这些学校已经实施的改进项目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明确了同时代学校改进项目的限制，总结出学校改进需要更多的概念化和评估，并指出进一步的学校改进需要更多的、以学校为根本的、与之相匹配的变革项目。